

120
主编 周军 杨雨润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
合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周军 杨雨润 主编

安徽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秦 阖
封面设计 刘传文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

周 军 主 编
杨雨润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合肥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5 插页：3 字数：32.5万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 7-212-00267-4/K·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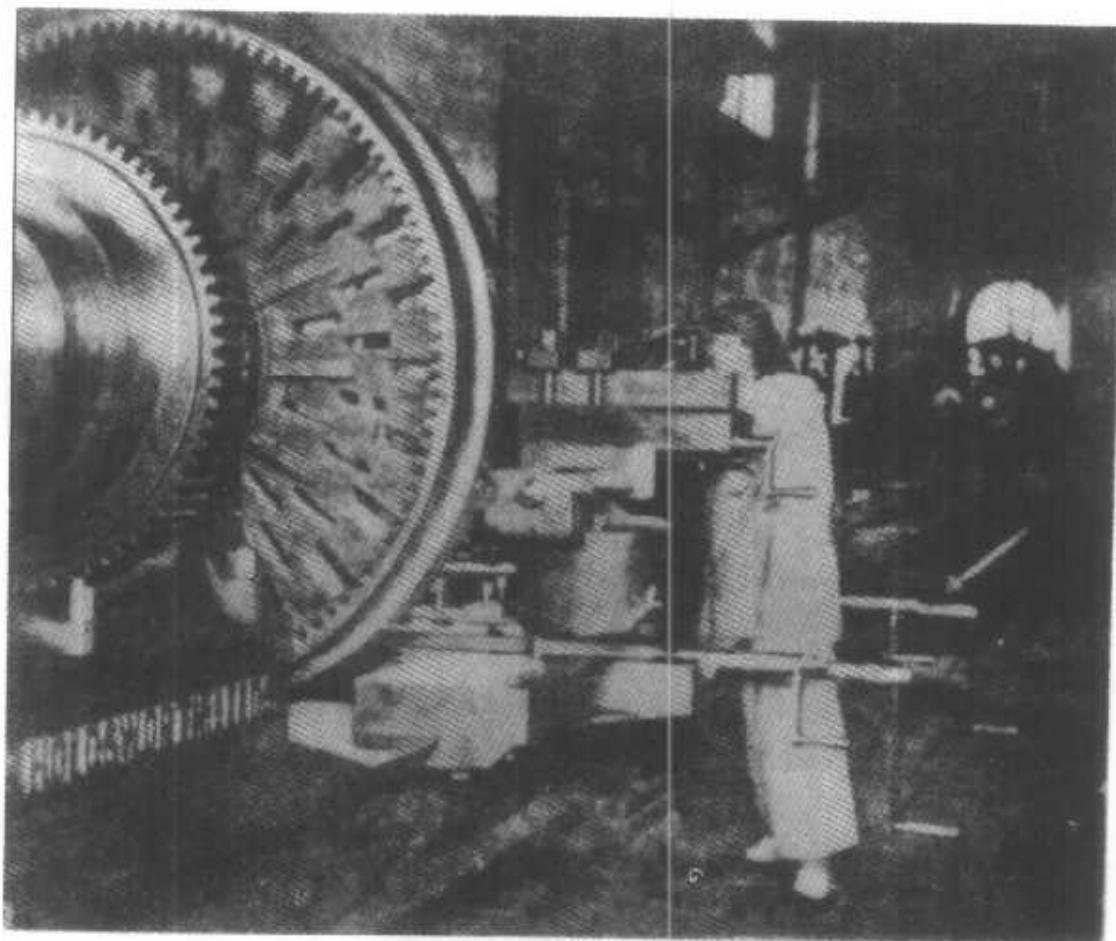
定价：5.85元（软精装） 7.50元（硬精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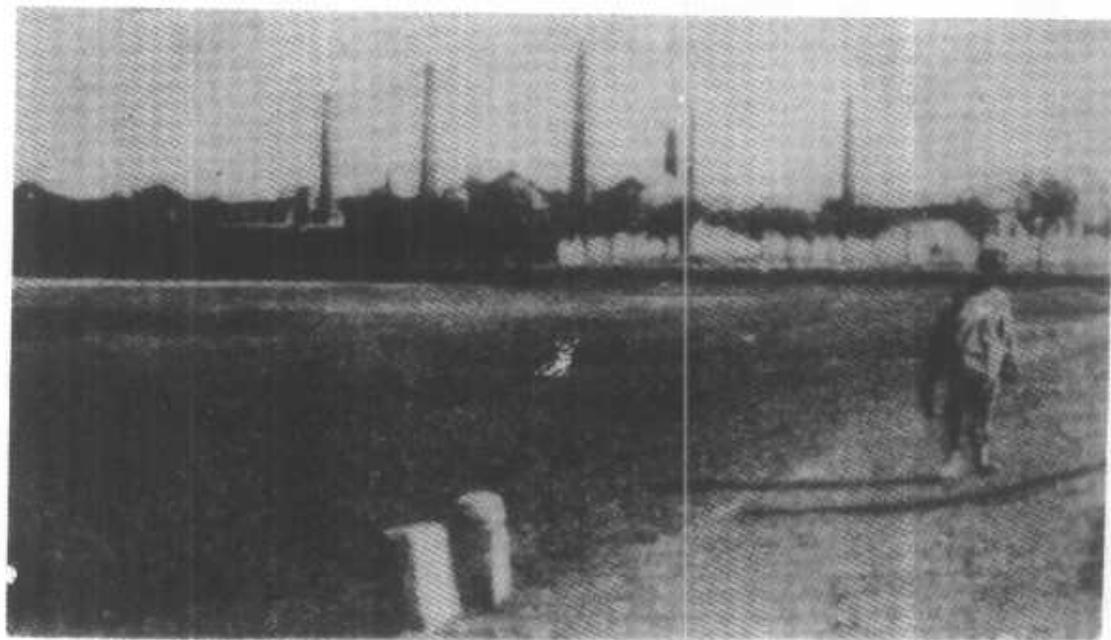
李 鸿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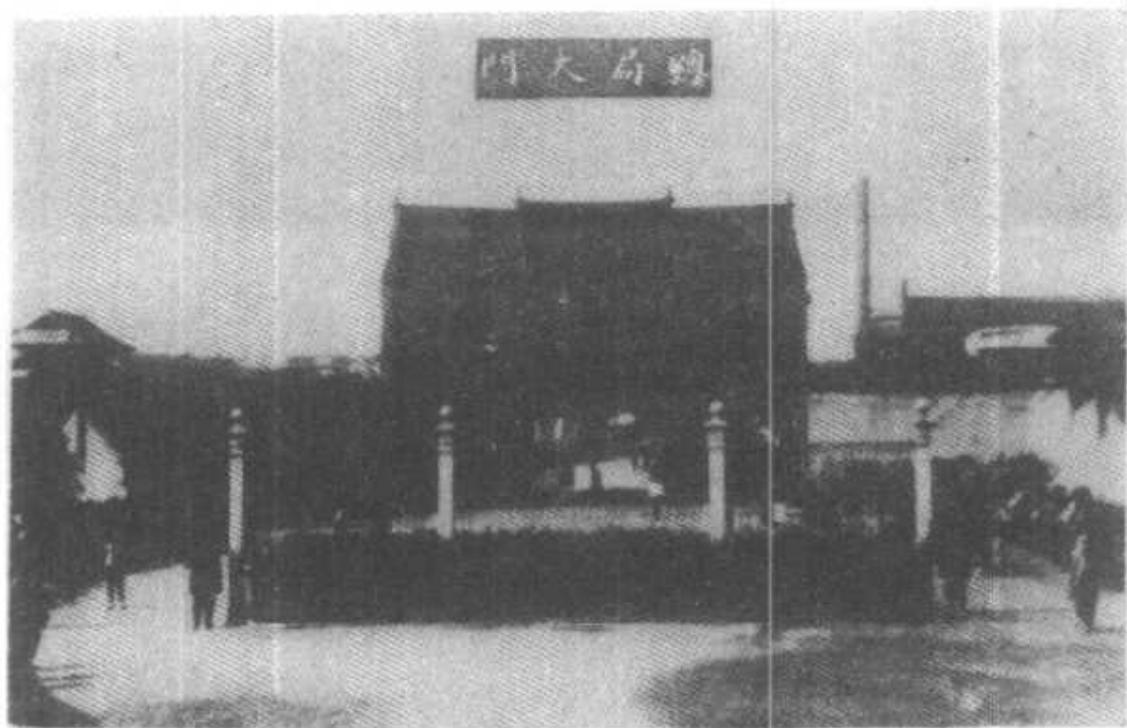
不同时期的李鸿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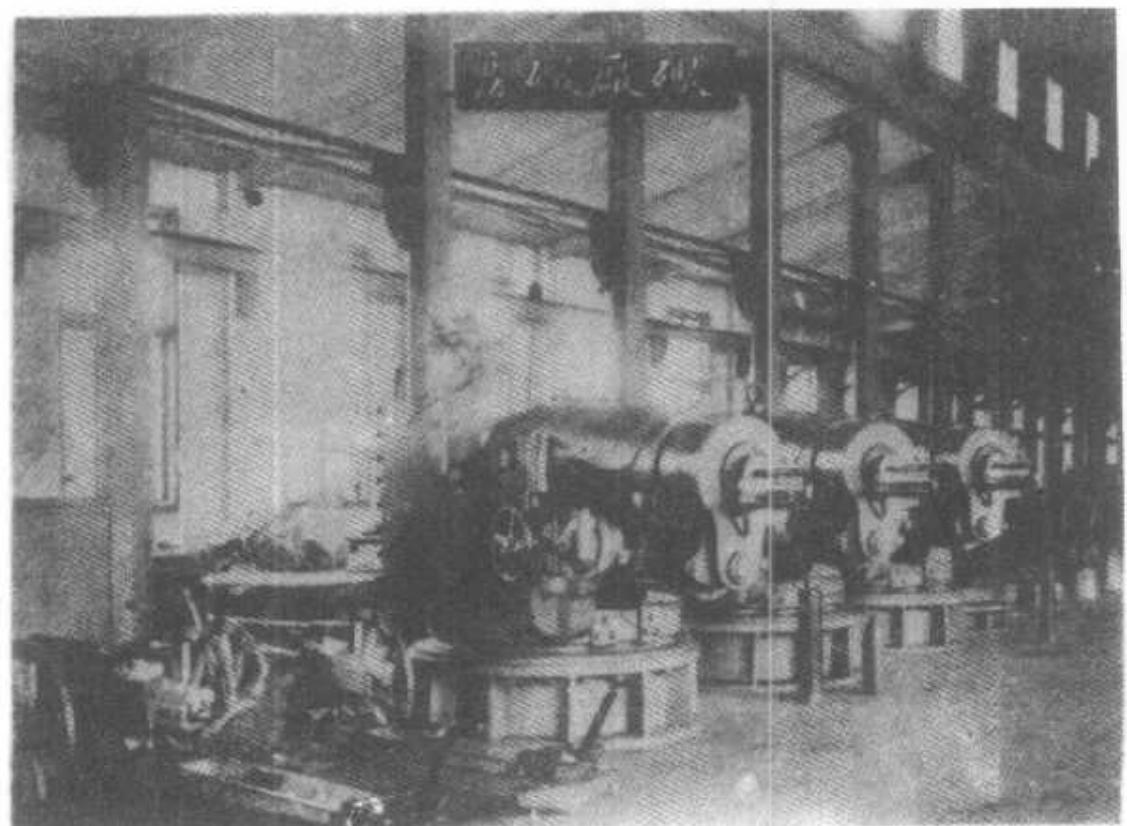
金陵制造局机械厂内部



天津机器局



江南制造局大门



江南制造局炮房

恭候區到確懶細圖說甚為詳備呈
方案呈聞願蒙光降為幸
即
隨函考究其薦諫一則並請高賜
稿抄存累將來必便佈達以便原應
用閱抄早乞仍轉為幸此此
旨物多矣
九月光

李鴻章手迹



合肥市东郊现存李鸿章享堂部分房屋



清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赠太傅一等侯李文忠公神道碑

目 录

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第一步的代表人物

- | | |
|--|----------|
| （代序）..... | 陈旭麓（1） |
| 略论李鸿章..... | 姜 锋（8） |
| 论李鸿章的近代化纲领..... | 戚其章（23） |
| 李鸿章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从魏源“师
夷长技”的认识到李鸿章“借法富强”的实践··· | 王鹤鸣（40） |
| 李鸿章洋务思想发展论..... | 刘光永（56） |
| 李鸿章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浅论..... | 张富强（90） |
| 李鸿章洋务思想简析..... | 孙志芳（114） |
| 简论李鸿章的洋务观..... | 沈 寂（128） |
| 浅论李鸿章的经济思想..... | 张格林（142） |
| 李鸿章经济思想和实践的启示..... | 赵贺春（154） |

目 录

- | | | | |
|-------------------|-----|---------|---------|
| 略论李鸿章与对外开放 | 董藩时 | 单 强 | (158) |
| 论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 | 刘学照 | (173) | |
| 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的民族电报业 | 刘灿河 | (189) | |
| 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中国的铁路建设 | 高鸿志 | (202) | |
| 李鸿章与洋务教育初探 | 金林祥 | (216) | |
| 李鸿章与轮船招商局 | 周海平 | (229) | |
|
 | | | |
| 李鸿章与近代中日外交 | 石培华 | (235) | |
| 论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的对外主和方针 | 汤奇学 | (252) | |
|
 | | | |
| 李鸿章——中国近代化军事改革的先驱 | 陆 方 | (264) | |
| 李鸿章海防思想论略 | 夏林根 | 何平立 | (276) |

目 录

李鸿章军事改革思想研究	皮明勇	(289)
李鸿章和淮军近代化	翁 飞	(303)
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	关 威	(316)
李鸿章“避战保船”辨伪	许 华	(332)
李鸿章与中国近代海军建设	戴 健	(339)
淮军装备研究	刘申宁	(345)
从李鸿章研究看评价洋务派历史人物的标准	余明侠	(355)
1988年10月“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		
讨论会综述	史 涅	(375)
建国以来李鸿章研究述评	张富强	(384)
后记	编 者	(423)

李鸿章：向中国近代化迈出 第一步的代表人物（代序）

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我们来到合肥，参加“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学术讨论会。几天来，看了同志们的论文，听了同志们的发言，受到不少启发。我向大家启发不了什么，只能谈谈自己的几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研究李鸿章的基本点是什么。

在座的诸位都是搞近代史的。近几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变化很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探讨中国近代社会在追求什么？大家已得出了一个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追求近代化，而洋务运动是近代化的开头，或者说是中国近代化迈出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与李鸿章的关系就很大。近几年来，在李鸿章研究中，所以有很大变化，反映在如何使中国实现近代化的角度上，李鸿章可以称得上一个代表人物。

中国要实现近代化，首先是怎样认识世界、走向世界、走出中世纪的问题。上海有一位中年学者朱维铮同志，最近写了

一本书《走出中世纪》，很有思想，但应该改“走”为“轰”，是“轰出中世纪”。因为近代中国不是走出中世纪的，而是被人家用洋枪大炮轰出中世纪的。当然，轰了以后，还是要靠自己走。可悲的是，经过一次二次鸦片战争，人家重重地轰了两次，很多人还不肯走。可贵的是，李鸿章在开步走，是努力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那时有一批人，与李鸿章同辈的有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等，年岁稍晚的有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他们几乎都是围绕着李鸿章进行活动。所以，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是由李鸿章带头迈出的。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创者、奠基人。我的看法是这样，他是洋务运动——近代化第一步的主要代表人物，是19世纪后期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开拓性人物。因此，甲午战争时期的孙中山、甲午战争以后的章太炎，都先后上书李鸿章，把希望寄托在李的身上。同时，正象不少同志谈到的，洋务运动中创办的那些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李鸿章做得最多。

一方面，我们承认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化途中的开头人物；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能忘记，他毕竟还是属于封建“体”里面的人，他本身并没有超出这个封建的“体”。他和他所代表的洋务派，不能说成如后来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只是从封建体里绽开了一个裂口，这是我们评论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一个基点，如果越出了这个基点，就同当时的历史不相符合。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来看，李鸿章开始走出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象李鸿章那样，对当时的世界和中国有这点认识的人并不多，数不出多少人来。就李鸿章对当时世界的认识来讲，比曾国藩、左宗棠要快、要多。当然，曾、左、李各有所长。但在认识世界和进行近代化的实践中，李鸿章的贡献的确要大一点。我们今天研究李鸿章

的意义也就在此。

第二点感想，如何评价李鸿章。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而不是李鸿章的全面评价。看来，会议的组织者是经过周密思考的，选择这样一个课题讨论、评价李鸿章，比较好谈，而且也有现实意义。当然，评论李鸿章这样一个对近代中国政治、外交有很大影响的人物，是很难回避经济以外的问题的。在晚清政局中，西太后在朝主政40多年，李鸿章在朝外主持军事、政治40年，赫德以总税务司干政50多年。这三个人物的交织活动，构成了中国晚清政治的基本格局。而李鸿章又首当其冲，负责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成为沟通朝内朝外、国内外的一个核心人物。这就牵涉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卖国贼？

在这次讨论会上，有的文章写了李鸿章的爱国思想，有的写了他的民族主义，这些论题在过去是不可能与李鸿章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李鸿章到底有没有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应该说是有的，因为他毕竟还是炎黄子孙。他搞的那些企业，多数是为了抵制洋货，分洋人之利的；他在军事上的建设，特别是海军，炮口还是对外的，更多的是对着日本侵略者。这难道不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行为吗？我们过去完全否认他，是不合情理的。

按照我们过去的“左”的思维逻辑，评价一个人不是爱国就是卖国，卖了国就不可能有爱国，这里面是不是还有着其他什么呢？我想，除了爱国和卖国之外，还有误国。应该说是爱国、误国、卖国这样一个三棱镜，或者叫做三点论。李鸿章有爱国之处，有民族思想，但不能否认他确有不少误国之处。例如甲午战争，虽然作了一些准备，但当时在他控制下的北洋海军和淮军的腐败是很明显的，更主要的是李鸿章的思想上，把

克敌制胜的希望寄托在其他国家的干预，比如沙俄的干预，搞“以夷制夷”，结果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丧失了战场上的主动权，被动挨打，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他的误国决不只是这一桩。古往今来，误国的政治家是常见的。

但是，李鸿章是不是有卖国的罪行？为此，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到俄国签订《中俄密约》这个问题上。据俄方主持密约的维特所说，李鸿章接受了300万卢布的贿赂，得以顺利签订密约。但没有其他实证材料，只有俄方的孤证，没有旁证。为此，我又特意问了这次到会的正在研究李鸿章外交的张富强同志，他说也没有发现别的记载。如果维特所说属实的话，那就很难洗清李鸿章的卖国罪责。《中俄密约》的签订，李鸿章的本意是想得到沙俄支持，以抵制日本的势力，实际上这个条约把中国东北的领土和主权出卖给了俄国，造成了俄国势力在东北的膨胀。所以，我们评价李鸿章，应该搞清爱国、误国、卖国三者的关系。至于李鸿章签订的其他条约，如《烟台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很难给他扣上卖国的帽子。因为在当时的形势下，不管谁去谈判，都无法扭转局面；而那时的清朝政府也很难找到比李鸿章更能应付这个艰难局面的大臣。

我倒觉得，在这些问题上，可以对李鸿章进行一些心态分析。例如，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尽管也在军事上作了许多准备，一俟临战前夕，他总是尽量避战求和。不仅甲午战争，可以说历次对外战争，李鸿章的态度大都如此。对此，史学界有过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李鸿章总是认为装备不如人，还是不打为好；另一种则说李鸿章是想保持“虎在深山”之势，不轻举妄动。这都是对他的心态分析。是否如此，可再分析。

又如在戊戌变法中，李鸿章始终是看西太后的眼色行事的；但另一方面，他又同情康有为搞变法，很爱惜梁启超的才

华。最近，黎澍同志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孙中山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说孙、李曾经见过面，并就时局交换了意见，用以说明孙中山和李鸿章之间有一种默契。这些迹象，足以说明，象李鸿章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很值得进行心理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心理（或心态）分析不是唯心论。根据一个人物当时的地位及所处的环境，分析他的心理活动及其对历史事件产生的影响，这种做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历史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是本世纪20年代从法国开始形成的。“文革”以后才传到中国大陆上来。当然，我国传统的历史著作中也不是没有心理状态的描写，象太史公在《史记》里描写的刘邦、项羽等人的心灵活动，就是这类笔法。但历史心理学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过去是没有的。现在看来，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引用一些历史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还是有必要的。

第三点感想，从人物评价所引起的历史反思。

过去，我们说李鸿章投降卖国、崇洋媚外，好象是铁案如山，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的。现在来了一个大幅度转变，说李鸿章是具有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的，是近代化途程的带头人，很有点戏剧性。出现这种戏剧性不是李鸿章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在研究中造成的。它同我们近年来从封闭体系向开放型转变有很大关系。在过去封闭年代，把他贬为卖国贼；在现在的开放中，又把他作为开放性人物。我觉得，过去把他的误国一概说成卖国，骂过头了。从走向世界的角度讲，他是称得上一个开放性人物的。

现在的研究工作中，也还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倾向：如果讲一个人是好的，总是从好的方面想；讲一个人是坏的，就从坏的方面着笔，层层加码。当前前一种倾向较多，我们不能不联想到，“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对一些剧作的评价，总